西漢揚雄潛心儒學 仿《周易》作《太玄》

文化淺談

司馬相如之後，西漢一代辭賦成就最高者當推揚雄。與年輕時就入仕為官的司馬相如相比，家世貧寒的揚雄，仕途要艱難得多。揚雄因口吃不善交談，平日只是研究經籍自娛，並未將學問當作功名利祿的踏腳石。

直到四十歲左右，揚雄才從蜀地來到長安遊學，當時他的辭賦在士人中已可稱獨步。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讀了揚雄的賦後，認為其才華可與司馬相如媲美，召為門下史，並向朝廷推薦。此後，揚雄待詔承明殿，成為官秩不低的文職官員。

此後數年間，揚雄隨漢成帝郊祀、巡遊，接連寫下《甘泉賦》《河東賦》《羽獵賦》和《長楊賦》，合稱「四大賦」，對成帝的奢靡與畋獵之風進行諷諫。四篇賦意氣風發，雄渾恢弘，氣勢雖略遜於司馬相如，卻打破了賦體主客答問的陳套而自成一格。

此外，揚雄的《蜀都賦》描繪成都秀麗山川與富饒物產，開創了後世京都大賦的先河。由於才華出眾，揚雄深為成帝欣賞，被任命為黃門郎。

揚雄當上黃門郎後，正好與王莽、董賢同事。此後先是王莽進位三公，繼而王莽退而董賢進，最後王莽復起而董賢被徹底打倒。從成帝到哀帝再到平帝，幾十年間朝廷有如走馬燈，大部分官員忙於交結奉承權貴，跟着王莽、董賢上上下下團團轉，但揚雄不喜歡鑽營奉承，始終遠離各種勢力的鬥爭漩渦。

經過幾十年官場經歷，揚雄已不再相信辭賦對君王和權貴有諷諫效果。他把從前苦心創作的賦統統丟掉，專心研究儒學。他仿照《論語》作《法言》，仿照《周易》作《太玄》，寫得典雅古奧，均為哲學著作。在《太玄》一書中，揚雄承認世界上的事物有變化、發展，自然界的事物都將轉化到它的對立面，人事也不能例外，表達了樸素的辯證思想。

在《法言》中，他反對當時盛行的讖緯、神仙和迷信。當時講讖緯的人把「聖人」神化，他竭力反對這種穿鑿附會的說法。他認為先知的人是有的，只是由於能由小知大、見微知著，是合理、科學地推斷出來的。對於方術所講長生不老的仙人，他認為並不存在，因為「有生者必有死，有始者必有終，自然之道也」（《法言．君子》）。

首著書研中國方言源流

揚雄還有一部語言學著作，名為《方言》，是中國第一部研究方言的專著。該書不僅發現了方言詞彙的古今區別與歷史演變，以及方言詞流通範圍的差異，而且對方言的成因作出了科學的闡明。《方言》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揚雄以一己之力，耗時二十七年，進行全國範圍的方言詞彙調查，把資料條分縷析、存異求同，寫出了一部流傳至今的名著。

王莽篡漢建立新朝後，揚雄一直在天祿閣從事校書工作，繼續一貫低調的作風，惟王莽一再施壓，揚雄無奈作《劇秦美新》，頌揚新朝功德。文章因辭藻華美，後來被蕭統收入《昭明文選》。

王莽篡漢之前曾造作不少符命，建立新朝後卻害怕他人如法炮製，遂下詔禁斷符命。劉歆的兒子劉棻因造作符命下獄，揚雄因當過劉棻的老師而受到牽連。當揚雄見到前來抓捕他的官吏時，從天祿閣上跳下，幾乎喪命。後來王莽認為揚雄只是個書呆子，便決定赦免他，僅罷官了事。

新朝天鳳五年（公元18年），揚雄去世，終年七十一歲。揚雄死後，有人問學者桓譚：「你一生推崇揚雄，不知道他著的書能否流傳？」桓譚回答：「一定能流傳。普通人賤近貴遠，親眼見到揚雄一生祿位不能過人，自然不重視他；後世人必將更關注他的著作。」果然，《法言》大行於東漢。

揚雄一生澹泊名利，不汲汲於富貴，不慼慼於貧賤，在辭賦、儒學等方面都取得極高成就，學問淵博，為西漢一代之冠。與揚雄同時的劉歆、桓譚等人都對他推崇備至。桓譚說揚雄「能入聖道，卓絕於眾，漢興以來未有此人」，將揚雄與孔子相比擬，可見其在當時學者心目中的地位。

●緩圓　資深中學中史科及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學工作三十年。

小知識



●揚雄肖像　網上圖片

揚雄（前53年—18年），字子雲，姓名又作楊雄，蜀郡成都（今四川成都郫都區）人，西漢哲學家、文學家、語言學家。揚雄提出以「玄」作為宇宙萬物根源的學說，強調如實的認識自然現象，並認為「有生者必有死，有始者必有終」。揚雄的形象常作為潛心於學術、不慕名利、不諳世故的學者的典型出現在後世的文學作品中，如李白《古風．咸陽二三月》（五十九首其八）中的「子雲不曉事，晚獻《長楊辭》。」

心不繫於外 逍遙自在其中

自由戲

很多中學生初讀《逍遙遊》，都會有一個美麗的誤會：以為莊子的逍遙，就是不用溫書、不用考試、不用理會規矩，隨心所欲，自由自在。彷彿北冥的鯤鵬，一拍翅膀就可以遠離所有煩惱，飛去沒有人管的地方。如果逍遙真是這樣，那未免太淺薄了。

莊子所說的逍遙，從來不是逃避責任，而是一場心靈的鬆綁，很適合埋在測驗、排名、比較之中的年輕人細細體會。

《逍遙遊》開篇的大鵬向來最吸引目光，「水擊三千里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」，聽起來何等瀟灑。可是莊子筆鋒一轉，悄悄提醒我們：大鵬要憑藉厚積的水、憑藉扶搖的風才能高飛，沒有風，牠也飛不起來。

換句話說，大鵬依然「有所待」，依賴外在條件，還不算真正的逍遙。至於蟪蛄、學鳩，笑大鵬飛得太遠，牠們只在樹枝之間跳躍，眼界局限在小小的林子，是被自己的認知困住了。前者受外物所限，後者被自身眼界綁住，兩者都未達至「無待」之境。

「無待」需不被外界評價束縛

何謂「無待」？就是「乘天地之正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」，不必依靠外在的風、別人的讚賞、分數高低、旁人的眼光，心靈自有安頓之處。

很多同學的煩惱，恰恰就是太「有所待」——待一張成績表定義自己的價值，待同學的評價決定自己開不開心，待每一次比賽的輸贏衡量成敗。考好了就雀躍，失手了就自我懷疑，有人欣賞便自信，被忽略便失落。我們的心，好像一隻飄在風中的紙鳶，線握在別人手裏，風向不由自己掌控。這就是莊子想點破的束縛。

學習不為「贏」享受進步過程

不過，這裏要小心，不要把逍遙讀成「躺平」。莊子從沒有叫我們不用努力、不用上課、不用盡本分，所謂「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」，不是叫人什麼都不做，而是做事的時候，不執着於一定要得到功勞、掌聲、名聲。

讀書可以是為了認識世界、滿足好奇，而不是只為搶一個名次；練習，可以是享受慢慢進步的過程，而不是只盯着結果。努力依舊繼續，但心裏少了一份非要贏的執念。這份狀態，才是「遊」。「遊」不是嬉戲懶散，是投入之中保有餘裕，不被事情吞噬自我。

中學歲月，正是比較最熾熱的階段。班裏總有排名，活動常有競爭，社交之中又容易互相打量。很多同學慢慢養成習慣，習慣拿自己的短處，去比別人的長處，人家數學好，自己便自卑；別人活潑受歡迎，自己便怪自己內向。莊子在這裏送給我們一劑清涼藥：萬物各有其性，大鵬適合高飛，小鳥適合在林間飛，不必強求所有人都活成同一個模樣。小大有別，卻不必因此分出高低。

我們不必把同一把尺，硬套在每一個人身上。接納自己的節奏，看見自己的獨特，心才會慢慢鬆開束縛。

我常見有些學生，明明本身不差，卻長期活在焦慮裏，一次考差，就把自己全盤否定，這就是把自我價值綁在一時一事的成敗上。

莊子的逍遙是教我們要認真做好手上的事，但不要讓這件事的結果決定我們是怎樣的人，要分清兩件事：考試盡力，是責任；成績起落，只是外境。外境有高有低，而內心的安定，可以自己守住。

這份逍遙，不一定要遠走深山、離群索居，在課室、書桌、日常相處之中，一樣可以修煉。當你溫書溫得疲倦，不再因為一時進度落後而苛責自己，當你看見別人閃光，懂得欣賞而不是心生嫉妒；當你盡力之後，願意接受結果，不困在懊悔之中——這一刻，你的心已經在逍遙而遊了。

莊子的文字汪洋恣肆，讀起來像一場浪漫的幻想，底層卻是很踏實的人生智慧。逍遙不是向外尋找一個沒有煩惱的桃花源，而是向內修煉，讓心不再輕易被外物牽引。年輕人不需要一下子就達到「無待」的至高境界，但至少可以學會慢慢鬆開那些不必要的執着。

風還是會吹，考試依舊會來，人生的比較也不會消失。但願我們都能像莊子說的那樣，腳踏實地做好眼前事，心裏留一片寬闊原野，自在遨遊。這，就是屬於我們凡人，最可貴的逍遙。

●籲澄 資深中學中文、中國歷史科老師，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。教學經驗豐富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、中國歷史參考書。

「有」「無」一體兩面 宇宙萬物本同源



本欄連載作者為孩子撰寫的《道德經》簡約通俗讀本。按原著章節順序，每章除原文、釋文、釋意及「與兒說」部分，系統闡釋「道」「有無」「無為」「德」等概念，並以跨文化比較和生活、親子案例講解，語言簡明準確，兼顧中西文化融合，適合大學生、年輕人及所有對中國文化有興趣的世界讀者。

【原文】

道，可道[1]，非常道；名，可名[2]，非常名。
無[3]，名天地之始；有[4]，名萬物[5]之母。
故恒無，欲[6]以觀其妙；恒有，欲以觀其徼。
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。
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

【註釋】

1：有版本謂「道可道」，而這裏採用了「道，可道」，以突出「道」作為概念的提出。另外，此處兩個「道」，前一個為名詞，與「道德經」中的「道」同意，後一個「道」，是動詞，意為「說」「講」。

2：這裏的「名，可名」，與上面的「道，可道」的用法相同，以突出「名」。也同理，第一個「名」，意為「道的名字」，第二個，意為「命名」。

3：無，指「道」在沒有被命名時的狀態。

4：有，指「道」被命名之後的狀態。

5：萬物，在此書中翻譯為「all things」「everything」「myriad things」，具體哪一種，取決於上下文的通順和語感。

6：有版本為「故常無欲，以觀其妙」。兩者的區別是「欲」的詞性和意思不同。通章讀來，這裏在說「道」之命名的「無」和「有」兩種狀態，「欲」在這裏，應是動詞，為「用來」之意。

【釋文】

道，是可以被言說的，但我這裏說的這個「道」不是日常中我們使用的「道」這個字所指涉的含義，比如：「道路」「規則」「原理」「方法」等等；我說的這個「道」，儘管我選擇用「道」這個字來命名，並不能完全表達我想說的「道」這個東西的全部涵義。

可在人類的語言系統裏，還不存在一個字或詞，能夠用來表達我所指涉的「道」這個東西的全部含義。因此，我也只好借用語言系統裏已有這個「道」字，來命名它了。

我所說的「道」，在它還沒有被我命名之前，我們可以稱它為「無」，指的是天地原初的混沌狀態；被命名了之後，它就是進入了一種「有」的狀態，關於它的一切也就可以隨之產生了。所以，「有」的狀態，可以被看成是萬物之母。

「道」被我定義了之後，一切也就可以開始了，萬物都有可能從「無」到「有」。因為使用了人類的語言系統來進行命名，萬物就都有了指涉它們的名稱，即「名」。

不過，我們還必須知道，名稱和其所指涉的那個事物其實並不具有絕對的等同性，它只是一個語言層面的指稱，一個符號而已。因此，要常常回到事物「無」的狀態，即原初的、混沌未開的、無法用言語來指稱的「道」的狀態來理解和認識它，幫助我們觀察它的玄妙和深奧；我們也需要認識「有」的狀態，即被命名之後在人類語言系統裏生成後的狀態，可以允許我們觀察宇宙萬物呈現出的千姿百態。

無論是「無」還是「有」的狀態，其來源和指涉是相同的，不過是同一事物不同的名稱罷了——就像一個硬幣，有正面和背面一樣。這兩者都十分的玄妙且深奧，可以說玄妙又玄妙，深奧又深奧，是我們認識和理解宇宙萬物所有奧妙的方法和入口。

【釋意】

任何一個事物在「無」的相面上是變幻莫測的，同時在「有」的相面中是不可窮盡的——這就是「道」，是事物最玄妙又玄妙、深奧又深奧的原因。譬如我們人，從父母精血到出生再到長大，亦可說是一個從「無」到「有」、此消彼長逐漸變化的過程，這也是「無」「有」的一種表現形式。

本章是《道德經》中最重要的章節，有幾個極其重要的關鍵概念，如「道」「有」「無」，與我們日常的認知非常不同。本期釋文已初步解釋了這些概念，下一期將幫助各位繼續釐清，並結合人生、成長歷程來理解。（二之一）

●秋塵　北京師範大學現當代文學博士，著有多部長篇及中短篇小說，文學評論及散文隨筆等作品見刊於本地及海內外報章。



●越南河內文廟——國子監　資料圖片

越南文廟紅牆綠瓦 與中華文化淵源深厚

文苑英華

走在越南河內文廟的紅牆綠瓦之間，我們總會生出一種既熟悉又微妙的「時空錯置感」。殿閣樑柱上筆力遒勁的漢字楹聯，彷彿在提點我們一段剪不斷、理還亂的中越歷史。春節時家家戶戶張貼的紅紙春聯，乃至祭祖香火，無一不在訴說這片土地與中華文明千絲萬縷的淵源。

漢武帝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，漢軍平定南越國，並在今越南北部及中北部（北起紅河三角洲，南抵今廣平省橫山一帶）設立交趾、九真、日南三郡，正式納入郡縣體制管轄。此後逾千年間，隨着中原官吏派駐、漢人移民，以及儒家經學、漢字書寫與農耕水利技術的持續輸入，紅河流域逐漸融入中華文化圈的制度肌理。然而，到了五代十國時期（約907年—960年），中原陷入四分五裂的亂局，嶺南地區落入劉氏「南漢」政權之手。這場帝國邊陲的權力危機，為越南本土勢力的崛起提供了歷史契機。

這時候，交州本土豪族與南漢政權展開權力角力，終於在公元938年（南漢大有十一年），雙方在白藤江爆發了一場改寫歷史的衝突。南漢高祖劉龔乘交州內亂，命其子萬王劉弘操率領龐大水師自海道南下，企圖一舉吞併交州；而遇刺身亡的楊廷藝（前節度使）之婿吳權，則自愛州北上誅殺矯公羨，為楊廷藝報仇。

劉吳二軍在紅河入海口要衝——白藤江相遇。吳權利用當地水文潮汐規律，預先命人在江底暗埋大量削尖包鐵的巨型木樁，然後趁漲潮時分派出輕舟誘敵深入。劉弘操不知就裏，率艦隊乘潮急進。午後江水退潮，水下木樁赫然露出，南漢戰船盡數觸樁傾覆。吳權指揮伏兵夾擊，南漢軍大敗，主帥劉弘操兵敗陣亡。

南漢從此再無力南顧。翌年春（939年），吳權稱王（史稱「前吳王」），廢除中原王朝所授的「節度使」官號，定都古螺，建立起獨立於中原王朝的政權。

自此，中原王朝對越南施行逾千年的「郡縣直接統治」模式宣告終結，交趾脫離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轄。嚴格來說，938年白藤江之戰後，越南擺脫的是郡縣體制；至968年丁部領平定「十二使君之亂」，建立丁朝，定國號「大瞿越」，才正式確立了完整的獨立封建王朝體制。除了明代永樂至宣德年間（1407—1427年）短暫復設「交趾承宣布政使司」這二十年外，中原王朝再未將越南納入郡縣版圖。

同文不同國 相近而獨立

越南不再屬於中原王朝的郡縣，卻在制度與文化上仍保留着濃厚的中華氣息，越南各朝君王為了在國內確立君權的合法性並抗衡地方豪族，更主動而系統地將中原的儒家經典、科舉取士制度、官僚體系與律令法典移植到國內。與此同時，它們也接受中原王朝（宋、元、明、清）的冊封——南宋淳熙元年（1174年）起，越南君主受封為「安南國王」，此後歷代王朝大致沿襲這套宗藩名分——履行朝貢外交以換取邊境安寧。這正是今日中越之間「同文不同國、相近而獨立」的千年鄰邦關係的形成原因。

●葉德平博士　香港教育大學「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文學士」課程統籌主任、「戲曲與非遺傳承中心」副總監，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、文化專著。